

新人文丛书

NEW HUMANITIES SERIES

主 编 ● 王晓纯 吴晚云

曾思艺
著

美的沉醉与生的执着

——中国文学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NEW HUMANITIES SERIES

新人文丛书

主 编 ● 王晓纯 吴晚云

曾思艺
著

美的沉醉与生的执着 ——中国文学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的沉醉与生的执着: 中国文学研究 / 曾思艺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12-8535-5

I. ①美… II. ①曾…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6330号

美的沉醉与生的执着: 中国文学研究

著 者: 曾思艺

责任编辑: 王 娟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糖晶书装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31(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19571(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wj_gm2013@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8535-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尤西林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吴 思	吴祚来
张 柠	李雪涛	汪民安	邵 建	陈晓明
单 纯	金惠敏	赵 强	骆 爽	夏可君
敬文东	谢 刚	谢 泳	黑 马	熊培云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刘夕海
刘永祥	孙德辉	曲 辉	张 轶	张卫平
张常年	李志强	邹建成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姝明	赵晓辉	秦志勇	袁本文
铁 军	鞠洪深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及其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文所

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的尊严，唤起内心的力量，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特地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目录

第一章 古代诗歌纵论	001
第一节 “自由”的演变——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渔父梦”	002
第二节 艺术形式的新探索——回文体诗概论	014
第三节 飞卿词与蒙太奇——试论温庭筠词的艺术结构	046
第四节 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创新——试论《秦妇吟》的艺术成就	056
第五节 以幽清闲寂的境界展示孤高脱俗的人格——试论林逋的诗歌	063
第六节 大胆新颖的结构 灵活多变的手法 ——简论《圆圆曲》对叙事诗的艺术创新	074
第七节 以词法写叙事诗——试论吴梅村叙事诗的艺术创新	080
第八节 抒写至性真情 追求个性自由——试论郑板桥的诗词	088
 第二章 清诗赏析	 101
第一节 深沉的历史兴亡之感——王士禛《秦淮杂诗》（其一）	102
第二节 浓情送别与清丽写景——王士禛《真州绝句》（其三、其四）	105
第三节 生活的清贫 精神的逍遥——郑燮《渔家》	108
第四节 融括与翻新——袁枚《马嵬》	110
第五节 文章憎命达 斯人独憔悴——黄景仁《都门秋思》（其二）	113
第六节 借咏史以讽今——龚自珍《咏史》	116
第七节 写实与象征——龚自珍《己亥杂诗》（选二）	119

第三章 清词试析 123

第一节 书信格式的友谊之歌——顾贞观《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二首 124

第二节 词中“三别”——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 129

第三节 千古兴亡 故国沧桑——朱彝尊《卖花声·雨花台》 132

第四节 壮阔的境界 悲凉的情绪
——纳兰性德《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 135

第五节 悲凉与旷达——张惠言《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其四） 137

第六节 借物以寓性情——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试析 140

第四章 毛泽东词赏鉴 143

第一节 借自然美景抒革命豪情——《菩萨蛮·大柏地》赏析 144

第二节 对传统登山文学的刷新——《清平乐·会昌》赏析 151

第三节 融丰厚的内容于短小的篇幅中——《十六字令》三首赏析 159

第四节 融悲凉沉郁与雄劲豪放于一体——《忆秦娥·娄山关》赏析 167

第五节 借昆仑表现伟大理想——《念奴娇·昆仑》赏析 175

第六节 新内容与旧形式的巧妙结合——《清平乐·六盘山》 185

第七节 咏物词中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赏析 191

第五章 现当代诗歌论析 201

第一节 烟岚翠锁巉岩路 闲踏衡山七二峰——白竹诗人的人品与诗品 202

第二节 一首融古典于现代的精美含蓄的爱情诗
——试析淡莹的爱情诗《伞内·伞外》 205

第三节 从现实关怀到终极关怀——中西融合的彭燕郊诗歌 209

第四节 孤独·忏悔·升华——中西合璧的《混沌初开》 216

第五节	地方色彩、生命关怀、终极意义的融合 ——彭燕郊晚年诗歌的湘楚意蕴	223
第六节	幻美的对话——评台客的诗集《石与诗的对话》	232
第七节	文学传统与现代情怀的结合——评台客的《见震921》	237
第八节	诗意的优美与生活的严峻——也谈王学忠的诗歌	242
第九节	楚骚之苗裔——读《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集》	249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诗歌与诗论	259
第一节	人性的共通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抒情诗的悲剧意识。	260
第二节	复古与创新——中西诗歌总体创作倾向论	272
第三节	在自然中探寻人生出路的诗人——丘特切夫与王维	287
第四节	自由的斗士 爱情的歌手——普希金与20世纪中国诗歌	301
第五节	比较文学视野中诗的理论 with 批评 ——评梁宗岱先生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316
第六节	混沌·直觉·自然·美——庄子与谢林美学观之比较	327
第七章	中国小说、散文研究及其他	337
第一节	中国式自由的演变——《金瓶梅》与中国古代自由观	338
第二节	武侠小说 哲理小说——金庸小说情节结构模式的哲理文化内涵	349
第三节	诗人与哲人的现代抒情——试论银云的山水游记	355
第四节	深思与媚俗——也谈《废都》	360
第五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忧虑——关于《中国结》	367
第六节	时代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我们为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375
第七节	开阔厚重而又富于见解的学术著作——曾方荣《反思与重构》序	380

—第一章—

古代
诗歌纵论

第一节 “自由”的演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渔父梦”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这首《渔父》词，描绘了江南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白鹭，桃花，绿水，鳜鱼，扁舟，色彩鲜丽，生机勃勃，然而这一切，包括词作的中心形象——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的渔父，又全都笼罩在一片如幻似真的斜风细雨之中，一切都淡化了，天地万物各自消失其边际而成为浑然的整体。此时，词人无知觉无意识的自我化入无目的无价值的自然，这样，万物在词人心里，词人在万物之中，物即我，我即物，自然本体与人的本体同化为一，达到了审养体验的最高境界——自然本体论境界，以致词人不仅不思归，而且忘归，并且忘却了作为“烟波钓徒”的自我，直呼“不须归”了！这境界自然不能代表渔父的心境，这只是渔父式的文人之词，是文人醉心渔父发出的心声，是文人醉心渔父而做的美梦，可以称之为“渔父梦”。但词中所包含的这一份率性归真、寄情缥缈的悠然脱俗，这一份对山水闲适之趣的尽情领略，这一份斜风细雨、人淡于菊的审美内涵，这一份自然本体与自我本体合一的审美境界，这一份淡泊澄洁、高蹈出世的逸情远意，深深触动了中国古文人心底里最敏感的几根心弦——隐逸，寄情山水，以山水为友，直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自然本体

与自我本体合而为一，而使他们做了千余年的“渔父梦”。此词一出，当时即有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等逐首共和，达“二十五”首，“递相夸尚”^①。此后五代李珣、南唐李后主等也相继仿作，至宋代经苏东坡、黄庭坚等推波助澜，^②“渔父梦”便越来越经常地让古文人们从宋代一直做到清代。“当个人的幻想（梦）为一群人所共有时，这个幻想便成为神话了”^③。可以说，自张志和的《渔父》词一出，“渔父梦”就成为一种神话、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沉淀于中国古文人们的心里，一遇外界触发，即发而为诗为词为曲为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学价值，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据独特的一角。当然，这种神话，这种“渔父梦”，绝不是突然间冒出来，而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极其深厚的文化背景。

一、“渔父梦”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渔父梦”是隐逸与醉情山水的必然产物。

中国的隐逸之风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末期，就有比干进谏而死，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去之的记载（《史记·殷本纪》），又有“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的传说（《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末期，又有隐士长沮、桀溺劝孔子避乱隐居（《论语·微子》）。庄子系统地总结了隐逸行为的几个方面，把隐逸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第一，是“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指出这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手段，目的是为了生存；第二，是“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洁吾行”，把隐逸上升到保持人格尊严的高度；第三，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把隐逸与自己哲学的核心——自由结合起来，从而使隐逸飞跃到保持精神自由的高度。庄子就这样把全身远祸、人格尊严、精神自由统一于隐士的身上，不过他更重视的是精神自由，对此，他做过生动具体的描述：“曾子

① 见《太平广记》卷二十七《续仙传》，又：张志和《渔父》词共五首，然而文中所引这首完全遮掩其他四首而千古流传。

② 见刘瑞骥编撰《唐五代词钞小笺》，岳麓书社，1983年，第17页有关材料。

③ 转引自温儒敏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

居卫，缁袍无表，颜色肿唼，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绝，捉衿而肘见，纳屣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以上均见《庄子·让王篇》），在如此窘困难堪的物质生活中却拥有如此自由广阔的精神世界！

魏晋南北朝时，隐逸之风大炽，但大多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只有陶渊明，把庄子的理论加以实践，从而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序》）。庄子的自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主观精神的自由，他笔下曾子那种三天没饭煮、破衣烂衫的隐士，只是理想的一个化身，现实生活中几乎无人能真正做到。而陶渊明，却通过耕种来具体实现庄子这一“独乐其志”的办法，成为隐士之中的“耕隐”。陶渊明虽然把庄子的理论在生活中加以实践，却并未庸俗化，他是真正的安贫乐道，把庄子隐士理论的三个方面都身体力行了：第一、他之归隐是由于“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远祸全身；第二、他挂冠而去，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为了人格尊严；第三、他通过自己的农事劳作，增进了对自然田园的爱恋，进而通过弹琴饮酒，流连自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一，在现实中找到了心灵安慰与精神寄托。陶渊明这种“耕隐”固然实践了庄子的隐士理论，相对于曾子那种苦行僧式的隐逸来说，也要现实得多、舒服得多，但相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古人来说，还是未免太过辛劳，而且太不浪漫了。耕种，在饱受“耕也，馁在其中”“劳力者治于人”教育的古人看来，毕竟是一件低贱繁重脏累的劳作。因此，陶渊明以后的中国文人没有一个能真正像他那样去“耕隐”，而只是像白居易、苏东坡等那样生活上“慕陶”，创作上“拟陶”，由于缺乏在田园劳作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式生活，很难真正领悟大自然的“真意”，“拟陶”之作与陶作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隐逸之风似乎难以为继了。

但是，随着道教与佛教的发展，隐逸与游仙结合起来（始作俑者，乃是郭璞及其《游仙诗》）了，尤其是盛唐之后，由于党争激烈、战乱连连，“士大夫对于社会的普遍的虚幻、失望情绪，使得他们的心理表现出愈加封闭、内向的趋势，性格上也变得细腻、敏感、脆弱，尽管千百年来儒家正统

的‘入世’哲学和‘扬声立名’的愿望在表面上支配着他们的外在活动，使他们依然循着旧路入仕、参政、读圣贤书、正襟危坐，但内心世界中，这些东西已经黯然无光，退避一旁，追求享乐的本能和颐养天年的愿望混合了自古以来就被允许与赞赏的隐居避世、独善其身哲学，在禅宗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适意人生哲学与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趣的推波助澜下占据了心灵，虽然它被隐藏在意识的深处，但比起口头上冠冕堂皇承认的传统人生哲学来，它更有力地支配着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一种追求‘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的审美情趣”^①，这样，文人们纷纷隐居山林，出现盛极一时的“林隐”热。“林隐”无须耕种劳作，颇有林泉高致：或弹琴饮酒，或吟风啸月。

但中华民族是一个讲实际、重实用的民族，对现世的一切特别感兴趣。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是典型例子，《易经》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也促使人们着意现世，而“禅在作为宗教经验的同时，又仍然保持了一种对生活、生命、生意总之感性世界的肯定兴趣，这一点与庄子相同：即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却又仍然具有生意”^②，儒庄禅相结合，一齐作用于唐宋以后的中国文人们，使他们既有儒家的实用，又有禅宗的适意，更有庄子的那一份浪漫。这样，他们必然觉得“林隐”太过枯寂，天地太窄，缺少浪漫，转而追寻一种既能忘情于山水，从而找到精神寄托，实现精神自由，同时又富有现实生活情趣，生意盎然，使人适意，并且浪漫潇洒的隐逸方式。张志和在此时应运而生，他继承了传为美谈的西周姜太公、东汉严子陵的“渔隐”传统，并且大大超越了楚辞中那位渔父的仅仅“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且“与世推移”（《楚辞·渔父》），而在自己的《渔父》词中达到了“天人合一”、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这一份平淡之中含生意，这一份适意与浪漫，正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归隐方式，完全符合深受儒庄禅影响的古文人心理，于是，“渔隐”便成为他们理想的隐逸方式，他们情不自禁地做了千百年的“渔父梦”——毕竟，中国古文人大多为“智者”，而非“仁者”，因而他们天性更倾向于“乐水”，而非“乐山”！

①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

“渔父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忤世、傲世而避世的文人的“白日梦”，是一种寄情山水、陶醉于自然，与万物合一，从而获得自由的士大夫梦，其核心是自由与适意，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哲学根源。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人们在与自然长期的搏斗中，建立了一种亲近自然、爱好自然的心理。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和哲学观念的进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天降时雨，山川出云”（《礼记·孔子闲居》）的说法，使山川与人世开始了亲和的关系。此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人生价值取向的指南，但它早已留好一条退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要较好地独善其身，大自然是具有物质实体性的精神寄托，儒家之祖孔子就对学生曾皙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那陶醉于自然的逸情十分欣赏。儒家已为人留下了一条失意时亲近自然、在自然中获得安慰与支持的路。道家更强化了儒家独善的一面，以与天合德的自由精神高扬了自然物的意义，并以这种新鲜活泼的自然向失意者提供一种新的人生观，特别是庄子，其哲学的核心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①，“把人作为本体提到宇宙高度来论说”，提出了“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同一性”^②，认为人的本体存在只有摆脱一切“物役”，才能获得绝对自由，从而成为无限。人的本体存在既然与宇宙自然存在有着同一性，人与自然就有一种较之儒家更为亲密的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庄学精神，对人自身之美的启发，实不如对自然之美的启发来得更为深切”^③，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篇》），而要求遗世独立，回归自然，建立了以自由为核心，通过自然体道，实现物化来获得自由的哲学体系，对后世影响至深。

魏晋玄学发展了庄子的这一精神，进一步追求在自然山水中安顿自己的生命，把与天地自然合而为一，悟道畅神，实现自由、超脱，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阮籍说：“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5页。

③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93页。

易，与道周始”（《大人先生传》），嵇康称：“因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答难养生论》），宗炳的名言“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画山水序》），更是把自然山水之美与宇宙本体“道”联为一体。由此，魏晋南北朝掀起了一股纵情山水、亲近自然、对自然美进行自由欣赏的热潮，山水之美正式成为人们独立的审美对象。

到了唐宋，禅宗把对自然的崇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时刻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自然相友相亲，甚至所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与瞬刻永恒也常通过自然来领悟，借自然形象来表达：“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著名的三境界——“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也无一不是通过自然形象体现出来的。禅宗善于从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中体会宇宙本体，“由于多借外在景物特别是自然景物来展现心灵境界”，而“这境界的展现又把人们引向了更高一层的本体探求”，因而“又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了中国人的心灵，使人们的情感、理解、想象、感知以及意向、观念得到一种新的组合和变化”^①。

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历史传统，醉情自然而与自然合一、实现自由与超脱的庄玄哲学，尤其是时刻与自然为友，于自然万物中进行本体探求的禅宗哲学，构成了“渔父梦”得以产生的深厚的哲学背景。

就这样，“渔父梦”一方面继承了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一方面承续了源远流长的醉情自然、实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文化传统，并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既能亲近自然、醉情自然、与自然合一，获得自我本体与宇宙本体的同一、实现自由与超脱，又有着盎然的情趣、活泼的生机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二、“渔父梦”的基本内容及时代特色

“渔父梦”产生以后，历经五代、宋、元、明、清，其内涵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但大体可对其基本内容依据时代不同而作如下概括：

^① 李泽厚：《禅意盎然》，载《求索》1986年第4期。

（一）自由与适意。这是张志和的正宗传人，主要在唐五代，宋代还保留了部分。如前所述，盛唐之后党争激烈，战乱连连，士大夫们对社会普遍失望，而庄玄哲学，尤其是禅宗哲学对自由及本体探求的因素影响正盛，因此，此时的文人们往往由衷地酷爱自然，陶醉于自然，吟风啸月，饮酒弹琴，以寄托淡泊高远之志，体现闲散适意之情，并力求与自然合一，也确实达到了自然本体与自我本体的同一，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如李珣的《渔歌子》：“柳垂丝，花满树，莺啼楚岸春山暮。棹轻舟，出深浦，缓唱渔歌归去。罢垂纶，还酌醕，孤村遥指云遮处。下长汀，临浅渡，惊起一行沙鹭。”何等的潇洒自由，何等的悠然超迈！因此，富贵如李后主也做起了“渔父梦”：“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也颇为逍遥自在。但写得最精彩的恐怕还要首推南宋的朱敦儒，其《好事近·渔父词》云：“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这首词深得张志和的神韵，但气象更阔大，意境更深沉，达到了人与自然表里俱澄澈、悠然合一的境界，结尾那在“千里水天一色”的浩渺背景上似明似灭的孤鸿，是人还是自然精神自由的象征，已浑然不可区分。这类表现精神自由，与万物合一的作品，宋以后极少，即使有也难达到这种高度，只有郑板桥《道情》十首之一等作差近之：“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这类作品中还包括部分纵情自然，以求一时适意、片刻解脱的，它们或醉情于自然，如和凝《渔父》：“白芷汀寒立鹭鸶，苹风轻剪浪花时。烟幂幂，日迟迟，香引芙蓉惹钓丝。”或欣羡渔父，如叶颙的《渔父曲》诗：“雨过暮天收，江空凉月出。轻蓑独钓翁，一曲秋风笛。宿鹭忽惊飞，点破烟波碧。”这类作品虽然也表达了自由与适意的题旨，但未能让自我本体与自然本体融而为一，因此境界上较之“天人合一”的作品稍逊一筹，而且不仅唐五代宋有，元明清三代亦不少见。

（二）蔑视功名，全身远祸。这类作品主要产生于政治黑暗之时，以南宋尤其是元代为代表，明清也常见。南宋时权奸当朝，陆游报国无门，